

他者之痛与空间正义

——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人”之关照

吴红涛

(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摘要] 哈维从“不平衡地理”的议题出发,通过对空间区隔所导致的人之问题和资本主义生产空间中的“身体之困”的反思,分析了空间中广泛存在的他者之痛。进而,在哀悼传统乌托邦意义行将消失的基础上,哈维提出了“空间正义”的构想,倡导以一种辩证乌托邦的勇气,来正视空间中的“他者之痛”,以积极政治学来建构充满正义的地缘空间。

[关键词] 大卫·哈维;空间;乌托邦;正义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4)03-0027-05

1967年,法国哲学家福柯曾在巴黎的一次聚会上发表了名为《异质空间》(Of Other Space)的主题演讲。直到1984年(福柯去世之年),这篇演讲才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某建筑杂志上。文中提出:“从各方面看,我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1]20} 福柯的此番言论直接回应了他的法国老乡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其在1974年出版了《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影响巨大。在列斐伏尔和福柯两位学者的思想引领下,西方学界发生了著名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等一批当代知名学者,都相继对空间问题表示出了极大程度的关注。

这些空间理论学者对空间问题的论述,或者侧重于空间与社会的互动,或者沉迷于空间与资本的交涉,对空间中具体“人”之情境的伦理关照相对有所淡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理论主义者们一个通病:过于信赖理论自我建构,忽视人情温度的生发。相比之下,以地理学家身份出道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则较好地弥补了这一

不足。哈维对空间问题的阐述,有极大部分是建立在对“人”的伦理关怀维度之上,如其所说:“空间之适当概念化的问题,是透过与空间有关的人类实践而解决的。换言之,有关空间性质的哲学问题,没有哲学上的解答——解答在于人的实践。因此,‘空间是什么?’必须代之以‘不同的人类实践,如何创造和使用不同的空间概念?’”^{[2]120} 哈维也正是力图通过对现代空间的症候式思考,来反观当今“空间人”的生存现状。更难能可贵的是,哈维所指涉的“空间人”,还特别关照了不同空间中的边缘或弱势群体。毫无疑问,哈维空间理论的这种特质很好地还原了“空间”的本色,因为“空间”原本就是人类生活和交往的地理性场域,如学者所说:“我们‘存在’,空间是我们的家。”^{[3]119} 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都可被称之为“空间人”。

随着城市化与空间问题的愈加突出,近年来,哈维的空间理论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些关注大多聚焦于哈维的新马克思主义背景,强调其空间理论对于资本主义地理政治的批判。然而,哈维空间理论与“人”的交涉关系却遭到了忽略。事实上,通观哈维较为著名的几部代表作,无论是《希望的空间》(Space of Hope)与《新自由主义简

[收稿日期] 2013-12-18

[基金项目] 上饶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大卫·哈维空间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001034)

[作者简介] 吴红涛(1984—),男,江西上饶人,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空间文化批判及文艺美学。

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还是《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与《后现代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其空间问题论述的背后, 无不都伴随着对人的深切关心。

一、“空间人”与等级区隔

1969年, 年仅34岁的哈维从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辗转至霍普金斯大学任教。霍普金斯大学坐落在美国大西洋沿海的一个重要城市: 巴尔的摩(Baltimore)。对于哈维的学术生涯来说, 这是一次无比关键的地理性转移。在《希望的空间》一书中, 哈维甚至将巴尔的摩视为他的第二故乡。而这个城市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也激起了哈维对空间和城市的极大兴趣。

让哈维感到不解的是, 尽管巴尔的摩市拥有全美国最为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教育资源, 但是它的人口平均寿命和教育水平却比较低下。通过考察他发现, 原来那些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教育资源, 对大多数居住在巴尔的摩的人都是不开放的, 只有富人或者贵族才有机会享用。这就直接指向了哈维空间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不平衡地理”(uneven geography)。在《希望的空间》与《新自由主义简史》两本著作中, 哈维都分别以“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作为其中一章节的主标题。

“不平衡地理”意味着什么呢? 以巴尔的摩市为例, 那些很好的学校和医院, 只供富人子弟进入, 而穷人的孩子只能就读于二流学校或者就诊于普通医院。也即是说, 富人与穷人的孩子在获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上, 在空间地理上有着严格的界限。对此, 哈维深感无奈: “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掩盖了长期的贫穷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不幸, 那些机构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不可企及的。”^{[4]133}

诚然, 教育或医疗的不平衡其实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 实际上, 这类现象在现代都市中已经屡见不鲜。更让哈维担心的, 是由不平衡地理所导致的“空间区隔”。仇恨与恐惧在这种区隔中开始显现, 就像巴西电影《上帝之城》(City of God)中, 平民窟作为一个近乎封闭的空间, 住在其中的穷人不仅嫉妒而且仇视富人, 种种针对富人群体的犯罪活动比比皆是。而作为还击, 富人也为自己的空间设置屏障, 以阻挡穷人的进入。于是哈维发现了这样一个富有意义的现象: 巴尔的摩市的富人大多都居住在所谓的“门控社区”里, 穷人、下层人、边缘人均被排斥在外。

诸如“门控社区”之类的空间形态, 在当代华裔

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那里, 被称之为“恐惧风景”。段义孚认为, 如今的城市已经“从空间上加以区隔: 有钱人住在市中心, 穷人住在郊外荒废的住房中。有身份/地位的市民经常抱怨街道秩序混乱。”^{[5]145}这种抱怨源自“恐惧”: 城里的有钱人或者贵族们害怕穷人觊觎他们的财富, 他们担心市中心过多的穷人将对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 “边界之所以无处不在, 就是因为威胁无处不在。”^{[5]6}于是, 理所当然地他们坚信穷人应该迁出市中心。这种排他性的社群主义倾向, 导致了空间中的等级性: 某些空间只供富人居住或工作, 穷人或者边缘人无权进入, 他们被划分或驱赶到另一些特定的空间形态中, 比如贫民窟或者郊区。由于平民窟和郊区环境险恶且无利可图, 它们很快便沦为了边缘空间, 无人管制, 且难以享受既定政策的优待和福利。针对这个问题, 列斐伏尔亦曾做出过诊断: “边缘地区和郊区的空间是未定型的, 同时也是受到严格约束的。在这个空间里, 贫民窟、棚户区 and 居住区, 很快就构成了边缘性的住宅区。”^{[6]34}

此外, 哈维还悲观地发现, 郊区、边缘城市和远郊地区正在“以一种极度非生态的趋势蔓延”。其中, “非生态”所指代的便是郊区所特有的“长途交通班车、夏天严重的臭氧浓度以及农用土地的丧失”。^{[4]134}这些问题不仅招致生态自然的破坏, 还让郊区和边缘空间的居民罹患呼吸道等疾病的机会大大增加。对此, 段义孚也早有认识: “传统上, 更多是穷人, 而不是中上阶层的人, 一直受到噪音的危害。”^{[5]129}

事实上, 通过空间“区隔”来消除“恐惧”的做法是相当不明智的, 因为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穷人和富人是否身处同一空间中。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分析城市安全问题时就认为, 那种力图通过门控监测来防止犯罪的举措是可笑的。在否定这类做法之后, 雅各布斯提出了一个富有创见性的方案, 她称之为“城市的艺术形态”。其认为, 城市中的所有居民, 不管贫穷还是富裕, 不管高尚还是卑下, 都是地位平等的舞蹈演员, 他们虽各有风格, 但又互相映衬, 共同组成一个秩序井然、和谐优美的整体。尽管雅各布斯的设想多少带有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 但她还是间接指出了空间“区隔”的致命弊病。

二、“空间人”与阶级地理

“不平衡地理”不单存在于城市的内部, 相反, 它是一个极为开放的概念。所以哈维并未将空间

中“他者之痛”的讨论单单停留在等级性上,通过分析,他还敏锐地发现“空间人”带有强烈的阶级性,这个问题陆续体现在了《希望的空间》和《新自由主义》两本著作中。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作为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哈维继承了马克思的叙事风格,将空间中的积极性建立在了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上。但与马克思所不同的是,哈维的批判始终与“空间”紧密相连,因为他相信:“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的功能了。”^{[4]23}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哈维曾提到1846年至1847年横扫英国的大萧条以及随后很快就席卷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这使得资本家们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策略。为了避免危机的重现,他们决定:资本积累必须从空间上进行转移。正如哈维所说:“1850年之后,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巨大扩张把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放到了全球性的道路之上”,两次世界大战在背后推波助澜,结果,“全世界的空间被非领土化,被剥夺了它们先前的各种意义。”^{[7]330}于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所谓的“跨国公司”开始大量涌现,资本家们陆续在非洲和诸多发展中国家开办工厂,雇佣当地廉价劳动力,并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迅速占领当地的经济市场。电影《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中的布罗似乎便是这种风向标的代言人:在肯尼亚买下大片土地,雇佣当地一千多名非洲黑人为其劳作,自己则终日狩猎与玩弄女人。这种现象在哈维的著作中再次得到了强调:

如果没有自己的“空间定位”,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它一次又一次地致力于地理重组,这是部分解决其危机和困境的一种方法。资本主义由此按照它自己的面貌建立和重组地理。它创建了独特的地理景观,一个由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和领土组织构成的人造空间,这促进了它在一个历史阶段期间的资本积累。^{[4]53}

这种做法无疑印证了恩格斯的那个著名观点:资本家们化解危机的唯一办法,无非就是使它从此地转移到彼地。而让哈维所担心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转移本身,而是由这种空间转移引致的异化对当地劳动者造成的诸多苦痛。一如希布鲁克(Jeremy Seabrook)在自己的书中所描述的:“诸多跨国公司在此地(发展中国家)签订契约,

……它们几乎全都主张低廉的薪水以及残酷的管理方式。……在那里,劳动者们甚至没有能力联合起来改变自己的境遇。”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希布鲁克还列举了几名工人的自述:“我们经常被侮辱。当老板生气时,就骂我们女工人是狗、猪,是荡妇,对此我们必须忍受且不能有任何反抗。……不管有多么疲累,我们都不允许回家。”^{[8]90}

人类发展史中,大凡以非正义的手段来谋取利益者,似乎就从不缺少正义的借口。针对这些广泛存在的“他者之痛”,资本家们搬出诸如“新自由主义”之类的幌子,巧妙地逃避着道德的指骂。新自由主义强调,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人性尊严与个人自由,所以要提倡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然而,对于那些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来说,自由还只是一个奢谈。在新自由主义的呼声中,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资本家们以“自由”为名而任加施展的暴力性压榨。换句话说,你们之所以被压榨,完全是因为自由市场所决定的,怪不了谁。“全球化”逐渐演变成了“全球不平等”,所以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带来的其实只是阶级力量的重建。贫富分化的极度加剧,竟然被不可思议地合法化了。作为一个“看上去很美”的修辞,新自由主义成功地掩饰了空间扩张产生的严重不平等现象。

三、“空间人”与身体政治

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空间于是被规划为某种工具性中介。列斐伏尔一早就预言道:“作为中介,一个这样的工具性空间,要么会允许通过暴力来实现某种连续性,要么会将现实的种种矛盾隐藏在表面上合理、客观的连续性中。”^{[6]30}由不平衡地理所引致的空间等级性与阶级性,已给无数“空间人”造成了生活与精神上的困窘,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这些“困窘”被各种巧言令色的话语隐藏了起来。而哈维对“空间人”身体境况的担忧,同样也面临着类似的“困窘”。

众所周知,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潮流,已为身体注入了太多定义。从女性的反抗,到青年亚文化的叛逆,无不隐现着身体的影像。身体美学的兴起,更是将身体演化成了一个个时髦而又投人所好的“话题”,一时间,拥者无数。看上去,身体似乎已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战场,任何文化现象都能在这里对号入座。前苏格拉底学派所宣扬的“人”(man)或“身体”(the body)乃万物尺度的命题,仿佛“灵光”重现。但是哈维却提醒人们:身体若要成为万物之尺度,首先要必须确保它自身的独立与自由。令人遗憾的是,哈维认为,现在仍有太

多人的身体正遭受各种空间的教化。因此,欢唱身体赞歌的日子恐怕还为时过早。

关于身体与空间的关系,福柯曾做过大量的研究,他通过对全景监狱、疯人院等特殊空间形态的研究,发现这些空间对人类身体具有强烈的规训模式,“空间人”的遭遇也便有了如下的描述:

这种模式意味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它监督着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它是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的。这些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功利关系。^{[9]155}

但是作为法兰西知识分子代表的福柯,因为过于天马行空地沉醉在他对空间、权力与知识三元辩证法的话语理论探讨,进而放弃了对具体“空间人”身体境况的继续发问。换句话说,福柯的身体研究,似乎更像是为揭示其背后的权力与意识形态而铺路。哈维则在福柯的基础上,多向前走了一步,对于作为“空间人”的劳动者的一系列身体遭遇,哈维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对劳动身体所涉及东西的彻底变革”,^{[4]100}为何如此?原因在于那些被安排在各种空间进行生产的劳动者,实则沦为了某种“商品”。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对劳动者身体的剥夺和利用,也逐步推向了极限。在电影《摩登时代》中,卓别林恰如其分地演绎了这个过程,劳动者也从“人”慢慢变成了一颗“螺丝钉”。作为一个隐喻,劳动者的身体就像机器中的“螺丝钉”,日以继夜地投入到各式各样的生产中,默默无闻,无以反抗。

简单说来,资本空间对人之身体的塑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利润,不惜采取加班、培训、计件等多种方式,对劳动者的身体进行强制性改造;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工作机会和更好的报酬,劳动者也会对自己的“身体”进行预先强化,以适应雇主的要求。哈维曾借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下的这段文字来说明问题:

这种生命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除了这种纯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4]104}

劳动者身体的完整性被无形地肢解了。因此,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身体能做什么,而在于“空间

人”的身体是否还属于他自己所有。如果连身体都不完整独立,何谈空间政治人的自由梦想?

再之,资本主义“空间人”不仅作为劳动者和交换者而存在,他们同样还作为消费者而存在于社会空间之中。因此,为了彻底掌控劳动者的身体,以防止他们的反抗,资本家们同样在消费环节施展了他们的遮掩术,哈维将这种遮掩术称之为“理性消费”:^{[4]107}“组织、动员并引导人的欲望,以说服、监视和强迫的策略鼓励积极的政治参与,这些成为了资本主义消费机构的一部分,反过来又对身体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压力,这个身体就是进一步积累所需要的‘理性消费’的场所和执行代理。”^{[4]107}显然,这种“理性”只是从资本家那里出发的“独断理性”。

在形色不一的消费中,人很容易产生虚荣的欲望与夸示心理,身体逐渐沦为消费的附属品。而那些还缺乏条件为自我身体进行金钱消费的“空间人”,更是在面包、住所等这些基本的消费需求中惆怅挣扎。生活逻辑于是变成了这样一个无解的循环:为了消费,必须工作;因为工作,就必须接受剥削。就这样,通过使劳动者受困于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欲望这样的概念之中,资本家们已轻而易举地在生产空间中获得了身体的顺从。而且,他们还能在无数劳动者的消费需求中为自己的商品赢得极好的市场空间。

四、空间正义的构想

有感于各种空间中广泛存在的“他者之痛”,哈维悲观地认为传统的乌托邦意义已慢慢褪色。众所周知,乌托邦最早是作为一个空间概念而提出的,它所指向的是一个和美、安定和公平的空间家园。但是放眼整个世界,贫穷、剥削、压迫、犯罪等这些颇具痛感的现象却比比皆是。所以,美国知识分子雅各比将自己的一本著作命名为《乌托邦之死》,以此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失望。而在哈维的理解中,乌托邦其实并非死去,确切地说,它发生了异变。为此,哈维还煞费苦心地为这些异变的乌托邦安排了一系列名号,比如私托邦(Privatopias),比如雅皮乌托邦(Yuppie utopia)。这些乌托邦主要是指那些专属于权贵阶层的空间形态,如门禁社区、摩天大楼、高级商场等,它们都以某种自我封闭的心态剔除了来自“空间人”的痛苦景观。换言之,在这些空间中,看不到“不平衡地理”所造成的区隔、困顿和痛苦,处于边缘和弱势地位的人们消失不见了。为此,哈维愤怒地将这些空间斥为“喂养市区怪物”的地方,变异后的乌托邦则被统称为退步乌托邦(Degenerate utopia)。

面对退步乌托邦空间中的“他者之痛”，哈维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提出了“空间正义”的期想。正如他自己所说：“公正、公平和正义观念在我们的词汇中已经牢牢地确立自己的地位，如果不求助它们，我们似乎便无法做出任何政治决定。”^{[10]383}概况来说，“空间正义”是指以一种辩证乌托邦的勇气，正视所有空间中的“他者之痛”，采用积极政治学来建构充满正义的地缘空间。但是哈维在展望这个期想的同时，随即也对空间正义的实现之路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因为他清楚，在这个以后现代思潮为旗帜的解构时代中，“正义”的概念早已变得模糊不清。

更糟糕的情况时，“正义”极易沦为某种权力和意识形态宣传的道具。从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到遍布东南亚的血汗工厂，这些异质空间的建造者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某种正义的化身。而诸如门禁社区、退步乌托邦的建立，更是有着足够多的正义性借口。后现代主义的信奉者们，正是因为看穿了这些欲盖弥彰的把戏，才对普遍主义怀有强烈的批判和警惕。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空间正义的能否恰如其分地得到应用，似乎是成问题的。针对这个困境，哈维借用了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论”一说。维特根斯坦认为，词语必须是一个意义的“家族”。这启发了哈维的思考，他提出不应把正义看成是一个绝对普遍或者独断的东西，相反，它是一个多元意义的“家族”集合：“社会正义并不是在意义上而是在意义上的‘家族’上具有普遍的共识，那种家族只能通过它们深嵌于其中的某一特殊语言游戏在能理解。”^{[10]381}这样做，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空间正义成为某种话语霸权，还能为空间正义的概念注入更多的阐释活力。所以，空间正义必须回归充满“他者之痛”的具体空间，回归无数遭受困顿的“空间人”。这种正义是一种情境化的正义，如哈维所言：“并不存在可以直接的作为规范概念的普遍正义，只存在特定的、竞争的、分裂的和异质的正义观念和话语，它们产生于特殊情境。”^{[10]394-395}

如何实现“空间正义”？针对这个问题，哈维并未给出一个明确方案。一方面，这显示了他作为一名学者的诚实；但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空间理论的某些盲区。就像对“空间正义”的构想，并不能只局限在理论和抽象层面的探讨上，否则它也只是一

个话语噱头罢了。而哈维最大的贡献，在于他通过对各类“空间人”真实之痛的考察，向这个世界提出了“空间正义”的未来构想。

最终，哈维还是将希望归置到了具体的“人”身上。因为他相信：“在根本上，我们是好奇的、有变革能力的生命，具有生动的想象力和各种可能的技能，我们已学会在不同的时空中以不同的方式把这些技能整合起来。”^{[4]204}在《希望的空间》中，他甚至使用了很大篇幅来讨论建筑师和蜜蜂的不同之处：虽然两者都能建筑空间，但是建筑师在建筑之前，头脑中会先有一个预想的方案，而这是蜜蜂所不能比拟的。进而，哈维提出了“建筑师”的伟大隐喻：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建筑师，虽然面临来自日常生活和各种环境的压迫与限制，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凭借自己头脑中对正义的向往，为人类的生活和行动建筑新的“希望的空间”。

[参 考 文 献]

- [1] 包亚明.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 [2] 哈维. 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M]. 王志弘, 译, 台北: 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08.
- [3] Tarthang Tulku, Knowledge of Time and Space[M], Oakland: Dharma Press, 1990.
- [4] 大卫·哈维. 希望的空间[M]. 胡大平,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5] 段义孚. 无边的恐惧[M]. 徐文宁,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6] 勒菲弗. 空间与政治[M]. 李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7] 大卫·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M]. 阎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8] Jeremy Seabrook. In the Cities of the South: Scenes from a Developing World[M], London: Verso Books, 1996.
- [9]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杨远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 [10] 大卫·哈维.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 胡大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 谢光前)

(下转第 43 页)

